

政治整合：高欢统战策略的影响及启示

王建钰¹⁾

1)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关系学院, 18363504829@163.com

摘要：作为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高欢从落魄户子弟成长为东魏实际掌权者的过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统战策略的成功运用。高欢通过把握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在六镇余部、门阀士族、地方豪强之间建立了利益共同体，不仅成就了个人的政治生涯，同时推动了北魏末年混乱政治秩序的重构。本文通过军事、外交、文化与精英网络四个维度，初步探讨高欢统战策略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在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提供典型案例的同时，揭示出统战策略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历史纵深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高欢；统一战线；政治整合；

1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通过对统一战线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是否仅是现代的政治产物，其思想与实践能否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相关的研究还是较为匮乏。因此，对中国古代统战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广义概念来讲，统一战线指不同社会力量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联合。中国自古便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等联合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运行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维护统治秩序，不乏团结政治精英、社会阶层、民族群体以及宗教势力等多个群体的统战实践。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统战在中国古代就已得到了实践。不少政治人物通过凝聚价值共识、构建利益共同体以整合政治资源，实现了政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这种东方政治智慧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镜鉴，彰显了中国传统政治在整合多元利益方面的独特优势。

高欢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始终面临着如何维持多元社会稳定，处理好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以及民族矛盾的问题。并且高欢所在的政治集团内部还存在多股政治势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进行整合。通过对高欢研究，发现他分别在军事、外交、文化以及权力分配四个方面采取了统战策略，有效地缓和了集团内部在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间因长期矛盾而形成的紧张关系，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深入剖析并借鉴高欢的统战策略，不仅能够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汲取宝贵的统战智慧，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南北朝时期各政治群体关系演变的历程。这一研究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作用。

2高欢面临的政治环境与统战需求

2.1 尔朱荣死后的北魏权力真空气局

在公元528年北魏权臣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实行政治清洗，胡太后和幼帝元钊被溺死，北魏皇室权威彻底崩溃。“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1]“河阴之变”导致了北魏政治系统几近崩溃。在事件发生后，虽然尔朱荣凭借极端暴力手段攫取了北魏国家最高权力，但因手段过于残忍，严重损害了统治的合法性，致使

^[1] 据《魏书》七四本传。《洛阳伽蓝记》《北史》四八本传都作“二千余人”。

尔朱氏政权认同性危机日益凸显。并且尔朱荣在掌握权力后独断专行,导致了其拥立的傀儡孝庄帝一直策划杀掉他。在尔朱荣遇刺身亡后,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尔朱荣集团分裂成多股势力并争相夺取北魏最高领导权,北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至534年北魏分裂时,高欢集团与宇文泰集团成为北方两大势力,并开启了“东西魏对峙”时代。这种互相对峙的局面迫使双方集团的领导者都必须考虑在集团内部进行整合并尝试建立跨地域的联盟体系。

2.2 高欢所面临的困境

高欢作为破落军户后裔,早期缺乏传统门阀士族依赖宗族本身所携带的政治资源。因为容貌俊美被鲜卑贵族女子娄昭君青睐,由于娄昭君嫁妆中附带了一匹马,才使他有机会得以投身军旅并开启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在军事生涯的起步阶段,高欢辗转于多股势力,先是参加了杜洛周的起义军,因看不起杜洛周的为人处事,想要杀死杜洛周,在刺杀失败后投奔葛荣,然后又归附到尔朱荣帐下。由于效忠尔朱荣时办事有力,同时又对尔朱荣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逐渐取得了尔朱荣本人的信任。尽管获得了尔朱荣的认同,但集团内部有不少人对高欢怀有敌意。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发生后,“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2],高欢劝尔朱荣取元家而代之的主张,引起了集团内部一些人的极度不满,贺拔岳甚至直接建议尔朱荣杀掉高欢。因此在尔朱荣死后,高欢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方面,高欢依附的尔朱氏集团内部有一股势力希望尽早除掉他。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北魏末期政治秩序崩解、各股军事势力割据的动荡局势中也缺少生存的资本。

在拥有自己的武装集团之后,高欢面临没有固定根据地以及稳定的粮草供应的困境。在率领六镇余部转移到河北地区后,必须依赖河北豪强高乾、封隆之等人提供支持。但高欢所率领的六镇余部与河北世家大族互相戒备。高欢担心自己只是被河北世家当作“工具性盟友”,利用自己作为反抗尔朱氏集团的“挡箭牌”,一旦自己麾下的部队消耗殆尽之后就会被河北世家直接抛弃。河北世家则是在向高欢让出冀州后,部分内部成员对于高欢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性努力的情况下就占有了冀州感到十分不满。这种迫于紧急形势下建立的联盟是在相互猜疑与排斥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十分脆弱,这就导致了这种临时性的联盟存在极大分裂的可能。

此外,高欢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孝武帝在西逃投奔宇文泰之后,他并未公开宣称退位,名义上依旧是北魏的正统皇帝。因此,宇文泰在迎接孝武帝后东西魏皆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北魏政权的正统所在。高欢在天平元年(534)拥立元善见为帝时,实际上是希望另立新帝来重新建立起政治合法性。

2.3 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南北朝时期持续百年的胡汉对立的局面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已经发生了转变。北魏自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通过迁都洛阳、废除鲜卑旧官名,仿照魏晋建立三省六部制、以及礼法改革和改汉姓等方式,使得汉族与鲜卑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甚至到了北朝后期,鲜卑贵族已自视为“中原士族”。《魏书》开篇述拓跋鲜卑与华夏共祖,“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通过追述华夏共祖,为其正统寻找血缘上的合法性。《魏书》还增设“岛夷列传”,蔑南方为“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视北朝为儒家礼乐文明的轴心,称“魏所受汉传国玺”,承袭秦汉之正统。表面上,南北政权之间争夺的是华夏正统地位,实际上源于南北政权对华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即认

^[2] 《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

同华夏的传统政治伦理,认同华夏大一统及华夷共祖共融的理念。^[3]汉族士人则开始学习鲜卑语言,不少汉人就藉以通晓鲜卑语而成为进入仕途之捷径。譬如汉人“孙搴,乐安人。高祖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重赏。”^[4]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习鲜卑语有着借此作为政治资本的打算,但也说明汉族与鲜卑之间的交流开始频繁。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为高欢在其集团内部实施统战与整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3高欢统战策略的实践

3.1军事统战网络构建

3.1.1收编六镇降户的统战策略:从“监督受护”到“绝对统属”

在尔朱荣死后,尔朱氏集团内部的分裂已经是必然趋势。高欢敏锐察觉到了集团内部的矛盾,并利用此次机会成功实现了军事力量的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高欢观察到北魏六镇降兵在尔朱氏所掌握的势力内处于被欺压的地位,因此尝试将其收归麾下。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六镇暴动后,约二十余万镇民流徙至河北地区,其中由葛荣统率的六镇余部在韩陵之战后被尔朱荣收编为“六镇降户”。“初,葛荣部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5]这些具有军事化特征的流民群体被尔朱氏收编后,由于经常受到尔朱氏的欺压,因此实际上对尔朱氏集团抱有敌视态度。“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谋乱不止。”^[6]六镇余部反叛不止,严重破坏了尔朱氏集团的稳定性,让尔朱兆十分头疼。当尔朱兆因“六镇反叛,诛之不可胜”而咨议对策时,高欢提出“宜选王腹心之人统之”的解决方案,并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向尔朱兆索要到了六镇降兵的管理权,这才使得自己手下有了一些人马。“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高欢)统领。”^[7]但谷川道雄先生曾指出:“高欢在取得六镇降户控制权后,双方关系并不是统治与隶属的关系,而是监督与受护的关系。”^[8]因此,为了使得六镇降户由组织松散的群体变成纪律严明、能够明确听从高欢命令的武装部队,高欢利用六镇降户因长期遭受边缘化而累积的愤懑情绪以及对尔朱氏集团的敌视态度,用语言诱导他们:“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9]通过揭露尔朱氏对六镇降户的残酷压迫,以及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悲惨遭遇,将自己塑造为六镇降户的利益代言人并激发起他们对尔朱氏的仇恨心理。同时,他以“同罹离乱之苦”的乡籍身份,唤起降户的共情心理,从而在情感层面上促使向高欢靠拢。最终,“众皆顿颡,死生唯命。”

3.1.2湓口东出的地理转移策略

在取得对六镇降户的管理权后,高欢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如何摆脱尔朱氏军事集团的控制,以及选择哪里作为根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此时河北地区的政治生态变化为高欢摆脱尔朱兆的控制范围提供了可能。在北魏孝庄帝被尔朱兆杀害后,支持孝庄帝的河北世家大族渤海高氏、封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钜鹿魏氏,于普泰元年(531)二月推举幽州刺史刘灵助为首领,起兵讨伐尔朱氏,“由是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10]。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向河北地区进行转移一方面可以脱离尔朱氏晋阳大本营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能够同河北世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尔朱氏。“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田鼠而食之,

[3] 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段超,高元武

[4] 《北齐书·卷二十四》

[5]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6]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7] 《魏书·卷六十三》

[8] 谷川道雄:《北齐政治史与汉人贵族》,《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9.

[9]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

[10] 薛海波.“剪除凶羯”: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再探[J].社会科学辑刊,2012,202(5):186.

面无谷色，徒污人境内，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更受处分。”兆从其议。”^[11]高欢借口以天灾致困为由请求转移，通过向尔朱兆暗示由于连年遭受霜冻和干旱灾害，他所管理的六镇降户因为饥荒甚至被迫挖掘黄鼠充饥，该群体已接近崩溃，如果处理不好这批六镇降户会对国家稳定造成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因此希望带领六镇降户东出滏口，进入河北境内。河北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农业基础雄厚，能提供稳定的补给。尔朱兆对于高欢的请求并未产生过多怀疑，反而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减轻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很快同意的高欢的请求，允许高欢带领六镇降户向河北地区转移。“欢至山东，约勒士卒，丝毫之物不听侵犯，每过麦地，欢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12]高欢向河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不仅解决了粮草供应的问题，还通过约束士卒、整顿军纪的行为来为自己争取人心。因此高欢在进入河北境内后很快获得了河北世家的支持。

3.1.3集团内部民族矛盾的调和

在迁离尔朱氏势力核心区（晋阳）后，高欢尝试进一步将麾下的士兵进行整合。他意识到六镇降户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其群体内部的民族构成复杂，涵盖鲜卑、汉、匈奴、氐、羌等多个民族。在当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鲜卑共轻华人”的时代背景下，集团内部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处理不好民族关系，不仅会影响到高欢军事集团的战斗力，甚至还会动摇高欢的统治根基。在这种情况下，高欢面对鲜卑族士兵，发出了“不得欺汉儿”的命令，还对鲜卑士兵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待汉族士兵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13]这些话语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欢军事集团内部民族矛盾的问题，但作为集团领袖的高欢至少在日常行为态度上并没有刻意的偏袒某一方，而是尝试通过言语安抚等行为来缓和集团内部的民族矛盾，使得各民族士兵能够暂时放下隔阂。高欢手下有一名汉族大将叫高敖曹，作战勇猛，曾经取得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深得高欢器重。高欢虽然生活习惯以及自我认同已经鲜卑化，在他平时交流时往往习惯使用鲜卑语，但在高敖曹面前，高欢会特意改成汉语发布军令。这一举动，不仅拉近了高欢同汉族将领之间的距离，向他们展示了高欢对于不同民族出身都采取包容的态度。同时也给士兵塑造了一个平等对待不同民族的形象，团结了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士兵，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3.2杂用夷夏”：权力分配体系下的民族整合策略

高欢在政治权力架构的设计中，通过广泛吸纳各民族精英并分类委以重要职务，构建了“杂用夷夏”的权力架构，以强化其集团内不同民族的认同与凝聚力。高欢始终维系着以六镇鲜卑为核心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自身的崛起根基，同时通过重用河北门阀士族以换取中原汉人士族阶层的支持。从高欢与杜弼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汉族士人以及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知：“天下浊乱，习俗已久……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14]甚至在后来高洋问杜弼治国者何人时，杜弼直截了当的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15]可以看出，汉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在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内也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高欢特别重视笼络汉族士人，在东魏内部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才担任重要职位。以中兴元年（公元531年）为例，高欢政治军事集团主要由怀朔镇豪强酋帅与高欢宗亲、北边

^[11]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

^[12]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

^[13]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

^[14] 《北齐书·卷二十二》

^[15] 《北齐书·卷二十四》

豪帅和河北大族和其他只身投奔高欢的人士五种势力构成。其中怀朔镇豪强酋帅 17 人, 占所统计五种势力总人数(57 人) 的30%, 与河北大族(19 人) 大体相当, 远高于其他三派势力。毫无疑问怀朔镇豪强酋帅与河北大族并列为高欢军事集团中的两大政治势力。但在所任官职品级上, 怀朔镇豪强酋帅担任正三品及其之上的官职有6人, 远低于河北大族的17 人, 说明该群体在政治地位上要弱于河北大族。^[16]此外, 怀朔镇豪强主要担任的是军事方面的职务, 例如大都督、都督、以及将军等。而河北汉族世家往往出任地方行政官员, 比如侍中、司空、地方刺史等。这种职位分配上的差异也进一步表明高欢意识到汉族士人与鲜卑集团在国家统治中具有不同的优势。汉族士人普遍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 擅长治国理政, 能够为治理国家提供建议和治理方案。南北朝时期天下动乱已久, 人人渴望安居乐业, 国家能否得到百姓的认可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的强大, 也表现在对国家有效治理的程度。此外, 以河北大族为代表的世家经过长期的经营已经在当地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并且与当地其他豪强、宗族势力紧密联结, 建立起了跨越地域、文化、阶层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影响力网络, 使得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动员地方资源, 为高欢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坚实保障。在此基础之上, 他们还能够基于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影响一定范围内民众的政治态度, 为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杂用夷夏”的政治权力分配策略, 高欢成功的在汉族和鲜卑之间搭建起权力分配体系, 有效的促进了集团内部汉族和鲜卑发挥各自作用, 确保不同势力都能够致力于实现高欢集团的战略目标。同时, 在当时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并存的背景下, 这一策略显著提高了汉族士人的社会地位, 打破了东魏内部民族之间的偏见与文化隔阂, 对于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3.3 “鲜卑其表, 汉法其里”的文化统战策略

在文化与思想认同构建方面, 高欢作为自我认同已经鲜卑化的汉人, 虽然在心理上更亲近于鲜卑一方, 但为了增强集团凝聚力, 他尝试提升汉文化的地位, 采取“鲜卑其表, 汉法其里”的策略, 在一定时期内有效提升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高欢积极吸纳儒家士人进入教育体系和智囊团队, 以此彰显他对汉族以及儒家文化的重视。同时还大力支持儒家的价值理念, 在实际行动中对汉族官员表现出十分尊重的态度。例如崔暹, 崔季舒等人, 崔暹一开始跟随高琛, 后来随着高琛前往晋阳去见高欢。高欢与其谈话后, 十分欣赏他, 授予丞相长史的职务。后来高欢起兵, 留崔暹在后方辅佐高琛。嘱托崔暹说: “丈夫相知, 岂在新旧。军戎事重, 留守任切, 家弟年少, 未闲事宜, 凡百后事, 一以相属。”握手殷勤, 至于三四。^[17]可以看出, 高欢对崔暹表现出十分的尊重的态度。崔暹在被授予重要官职之后, 先后上表弹劾了尚书令司马子如、尚书元美、雍州刺史慕容献, 又弹劾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 详细列举了他们的罪状, 这些人有些是高欢起于微末之时的故交, 但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免去官职的命运, 甚至有些人因此被处死。高欢在给邺下勋贵的信中写道: “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 后为吾儿开府谏议, 及迁左丞吏部郎, 吾未知其能也。始居宪台, 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 尊贵亲昵, 无过二人, 同时获罪, 吾不能救, 诸君其慎之。”^[18]虽然高欢有利用汉族官员制约鲜卑贵族的考虑, 但也从侧面体现出高欢有意在集团内抬高汉族士人的地位。高欢回到京城时, 百官站在大道上迎接他。高欢握住崔暹手表达对崔暹的赞扬与感激之情: “往前朝廷岂无法官, 而天下贪婪, 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 不避豪强, 遂使远迹肃清, 群公奉法。冲锋陷阵, 大有其人, 当官正色, 今始见之。高欢父子, 无以相报。”^[19]为了表达器重, 高欢还亲自赐给崔暹好马, 让他骑马跟在自己身

[16] 薛海波, “剪除凶羯”: 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再探[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202(5): 191.

[17] 《北齐书·卷二十二》

[18] 《北齐书·卷二十二》

[19] 《北齐书·卷二十二》

后。当马受到惊吓失控后，高欢还为崔暹拉住马缰。高欢通过语言以及行为上表现出尊重的态度，顺利赢得了集团内部汉族的认同。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高欢十分注重搜罗人才，尤其是汉人中的才学之士，如范阳卢景裕等，以充实自己的人才团队。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才学之士纳入到东魏高层教育体系中，史书记载，高欢对文化与教育十分重视，“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通过将儒家文化纳入教育体系的方式，不仅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汉族文化，同时也使得一些跟随自己征战的鲜卑功勋及其子女一同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这种方式，无疑加强了鲜卑与汉族之间在文化方面的联系和融合，成功在东魏不同民族之间创造了一种跨越民族界限的认同感。高欢的家族成员共有七十九人，其中接受汉文化的有六十八人，占86%多；没有接受汉文化的有十一人，约占14%。而在接受汉文化者中，有著述的计有三人，约占4%；博学或专精一经乃至数经却无著述者有十二人，约占18%；汉文化修养较低者有五十三人，约占78%。可见高齐宗室成员绝大多数接受了汉文化。^[20]高欢的继任者高澄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高澄年轻时期，“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以为娱适。”^[21]对于那些才学出众、声名远扬之士，高澄都尽量给予举荐与擢升的机会。即便有部分人才尚未跻身显赫之位，也被他招揽至麾下，尊为座上宾。在每次组织的山林园游及宴饮活动中，这些人才均被特别邀请参与，期间不仅进行射箭等技艺的展示，还吟诗作赋，各展所长。

3.4 “招怀远夷”的外交统战策略

3.4.1 西魏-柔然联盟破裂及高欢的外交介入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同战争相伴随的各民族互相之间交流交融的频次也逐渐增多。柔然是在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曾多次与北魏发生军事冲突。北魏分为东西魏后，东魏的首领高欢和西魏的首领宇文泰都试图将柔然拉入己方阵营中，以增强己身的力量，削弱对方阵营的实力。“塞外诸国唯此为大。既丰沮泽之产，实同娇子之疆。世约和亲，恒为与国……雄国武略，复振北土，稟街无阙，輶轩继路。”^[22]可以看出当时柔然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据史料记载，柔然先是同宇文泰所领导的西魏和亲，西魏大统初年，文帝“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女称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继之，大统四年(538)，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指示魏文帝元宝炬废其皇后乙弗氏，纳柔然头兵可汗阿那瓌之长女为后。”^[23]通过和亲手段，西魏同柔然建立起了联系。然而，“魏主虽限以大计，而恩好不忘，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24]魏文帝虽然废除了皇后乙弗氏，改立柔然公主为后，但夫妻旧情不忘，仍希望有一天能够恩好如初，招致柔然公主记恨。会柔然举国渡河南侵，时颇有言柔然以悼后故兴师者，帝曰：“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邪！虽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颜见将帅！”乃遣中常侍曹窋手敕赐文后自尽。文后泣谓窋曰：“愿至尊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遂自杀；凿麦积崖而葬之，号曰寂陵。”虽然最后以乙弗氏最后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边境的安宁而自杀，但是此事过后，魏文帝与柔然公主渐生嫌隙，夫妻之间不睦。两年后，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年仅16岁的柔然公主去世，和亲的纽带已经消失，西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此时，高欢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借机派遣使者离间西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史载：“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杀阿那瓌女，妄以疎属假公主之号，嫁彼为亲……彼女即见害，欺诈相持，不仁不信，宜见讨伐……当以天子

^[20] 黄寿成. 北朝后期高欢家族与宇文泰家族汉化之比较[J]. 许昌学院学报, 2017, 36 (06): 41.

^[21] 《北齐书·卷三》

^[22] 《魏书·列传第七十》

^[23] 《魏书·后妃传》

^[24] 《魏书·后妃传》

懿亲公主结成姻媾，为遣兵将，伐彼叛臣，为蠕蠕主雪耻报恶。”^[25]高欢的游说起到了作用，阿那瓌决定“归诚东魏”，而且还两次派人到东魏为其长子庵罗辰求婚。高欢十分重视这次和亲，亲自检查和亲的嫁妆及礼品。此外，在和亲队伍出发两个月后，高欢担心中途有变，从京城出发，追上和亲队伍，将公主亲自护送到了楼烦之北，并且在那里接见慰问了柔然使者，向他们送了很多的礼物，成功在东魏和柔然两国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3.4.2 初步和亲到边塞持久稳定：外交统战策略的继续深化

此后，为继续巩固两国之间的联盟，防止阿那瓌再次倒向西魏一方，高欢再次派遣使者出使柔然，为其世子高澄求婚，然而阿那瓌直接了当的对使者说：“高王自取则可”。亲自迎娶柔然公主无疑会给高欢造成极大的压力。一方面高欢年龄大了柔然公主三十多岁，迎娶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公主在舆论上可能会对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高欢正妻娄昭君家族显赫，在东魏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高欢也不敢轻易得罪，多方面的因素使得高欢对于迎娶柔然公主这件事情十分犹豫。然而高欢的妻子娄昭君深明大义，史书记载欢犹豫未决，娄妃曰：“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娄昭君与世子高澄、骠骑大将军尉景一起劝说高欢，认为两国联姻并非儿女私事，凡事当以国家利益为先，最终促使高欢下定决心迎娶柔然公主。武定三年（公元545年），高欢派慕容俨到柔然迎亲，等到柔然公主到了东魏，娄昭君主动“避正室处之”，给了柔然公主很大的尊敬。柔然公主嫁入东魏后，高欢对这位来自柔然的公主相当重视和照顾。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聘，仍戒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神武尝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舆疾就公主。其见将护如此。”^[26]即使自己身患疾病，还承受了来自柔然公主叔父秃突佳的怒火，高欢仍然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与忍让。为了长期确保与柔然的友好关系，高欢不仅亲自迎娶了柔然公主，还在其子高湛年仅八岁时，便向柔然提出联姻请求，最终成功地将阿那瓌可汗的孙女邻和公主许配给高湛。高欢的和亲政策无疑是有效的，通过与柔然的和亲，有效地削弱了西魏阵营的力量，同时确保了东魏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通过建立的外交关系网，高欢成功地巩固了东魏政权的安全环境，并为其后续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东魏边塞无事，至于武定末，使贡相寻。”高欢“招怀远夷”的外交统战思想及其实践，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对协调民族关系、巩固政权和加强高欢本人的政治地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公元532年高欢拥立孝武帝元修即位，经历控制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再到公元547年去世，在这十五六年的时间内，无论是北魏还是东魏，都与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友好关系。北方的柔然，西部的嚙哒等，都纷纷遣使朝贡，有些还非常频繁，如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即位之年（532），柔然等少数民族政权一年之内就朝贡四次，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甚至一月之内就朝贡两次，其频繁程度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27]高欢在东魏时期推行的和亲政策，通过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建立联姻关系，在减轻边境军事压力基础上，为后续北齐继续维系这一和平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东魏统治期间直至武定年间的结束，不仅边疆地区保持着相对安宁的状态，在北齐取代东魏后，“柔然亦岁时往来不绝”。这进一步证实了高欢采取的外交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实现了短期内的战略目标——确保边境地区稳定，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以借鉴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典范。

4 高欢统战策略的现实启示

高欢在通过婚姻获取了初始政治资源后，首先在军事层面进行整合，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心武装集团。在拥有武装力量后，通过文化以及精英网络构建以调和内部矛

^[25] 《魏书·列传第七十》

^[26] 《北齐书·卷八》

^[27] 崔明德.高欢民族关系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29(3):39-40.

盾来提升集团凝聚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巩固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高欢为了争取不同的政治势力所采取的策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针对性的策略成为他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的关键所在。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当代开展统战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统一战线所面向的群体十分广泛，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一群体的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统战工作应当摒弃“一刀切”的思维，积极了解各方诉求。例如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少数民族代表、港澳台同胞等，他们的认同基础、沟通方式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而统一战线的凝聚力正是来源于让每个群体都感到“被看见、被尊重”。

尽管高欢依靠统战策略为东魏-北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终未能从根本上整合集团内部的各方力量，使政权难以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结局。在高欢去世后的短短几十年，原本综合国力更强的北齐最终被地狭人稀的北周吞并，学界普遍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两国在整合政治力量的方式和效果上有着本质差异。与高欢采取区别化安抚各个政治势力的方式不同，宇文泰采取了构建共同身份认同的方法来进行政治整合，通过“赐胡姓”、“府兵制”等制度安排，将不同族群纳入统一的身份中，并基于此形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既具备鲜卑武人的军事优势，又融入了汉人的组织架构和文化。可以看出，统战工作不是“权宜性的安抚”，而是一项“制度性的融合”。只有构建起一套能够包容各方力量、确立共同的政治认同的制度框架，将各个阶层、群体以及不同身份的人们置于更高层次的“共同体”中，才能够使得统战工作不会因为个人权威或者政策的变更而失去效果。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以高欢为典型案例的中国古代统战策略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本质区别。高欢的统战为了达成联合一定社会力量的目的，往往为了达成想要的目的甚至放弃原则，而无产阶级所的统一战线需要在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进行。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时，采用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光明正大的方法，既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既不强求一律，也不搞无原则的联合，使得统一战线既能够始终保持广泛的包容性，又不偏离正确的方向。